

基辛格：1971年中美“破冰”有個前提，今天這個前提依然有效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 白雲怡 陳青青】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一場紀念五十年前他對中國的秘密訪問的活動上表示，1971年中美實現關係“破冰”的重要前提是，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國視台灣為本國的一部分”，五十年後，這一前提依然有效，且應比1971年時“更加有效”。他同時呼籲，美中應儘快舉行像當年尼克松訪華時那樣的對話，以解決兩國當下的分歧。

1971年7月9日，時任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促成中美關係“破冰”。在一場今天在釣魚台舉行的紀念當年訪問的活動上，這名美國前高級外交官以視頻形式發表開場演講。他表示，1971年，美中雙方都希望通過擱置分歧和尋求對話來緩解緊張局勢，當年兩國的選擇對今天的中美關係局勢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五十年後的今天，美中兩國間的合作需求並沒有減少。兩國關係仍然至關重要，甚至比1971年時更加至關重要”，基辛格表示，中美之間的衝突將會分裂整個世界，而如果試圖讓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站隊，只能為它們帶來更多的壓力，並讓局勢變得更加困難。

他同時強調，在1971年對華訪問中，美方所承認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人把台灣視為國家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是奠定中美關係的前提條件，美國承諾不會挑戰這一立場。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兩國都應該明白，這一兩國關係的前提條件依然有效，“甚至比當時更有效”。

“今天，我們需要一場像當年尼克松總統和毛主席在1972年那樣的對話”，基辛格表示，“我很希望能就重大問題儘快展開這樣的對話……世界上其他國家需

要美中兩國通過對話解決分歧……此時此刻，世界的和平、穩定和前進，將取決於美中雙方的智慧。”

這名美國著名戰略學者同時提醒稱，美中雙方都需要明白，正如五十年前兩國所明白的那樣，並非所有問題都能在短期內找到解決方法。

近年來，基辛格與尼克松當年開啓的“對華接觸”政策頻頻遭到華盛頓政策圈的質疑，不少美國政客和學者主張，“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因為美國未能成功推動中國成為“西式民主國家”，因此，美國未來應與中國“脫鉤”。

對於這一觀點，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的翻譯、美國前駐華公使和前助理防長傅立民在當天的活動上表示，自己不能苟同上述觀點。他表示，推動中國改變自身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顯然不是當年美國與中國接觸的目標。即使這是目標，也是顯然無法實現的。事實上，在當年的中美聯合公報中，兩國均承認彼此制度不同，但有共同的利益，並可以在此之上展開合作。“我完全不認為美中交往是失敗的，我希望我們能重新接觸，就像當年基辛格博士做的那樣。”

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中方翻譯唐生也表示，中美關係在過去五十年中的發展得益於當時兩國領導人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和長遠眼光。在當年的訪問中，中美雙方誰也沒有幻想能通過接觸改變對方，兩國目標非常明確，純粹因為本國利益而走到一起。這一清醒的認識和政治智慧對今天的中美關係仍有借鑒意義。



北大教授發聲：請禍國殃民者，不要再誤判美國衰退

姚洋教授，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執行院長，也是“金融40人”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不要誤判美國衰退中國遠遠未到挑世界大樑的時候

中國要意識到，美國的行爲並非完全針對中國，其作爲多年的全球領導者，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格局，也有需要調整的空間。

多年來，美國爲建立和維持世界貿易體系有不小的付出。比如，WTO規則是美國創造的，這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增長有巨大意義，美國本身成爲中國產品的最終需求者和最大外需。在很長時間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超過中國對全世界的貿易盈餘，也就是中國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相當於都是貿易赤字。

如今，美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不斷地極化，1%的最高收入群體財富比例不斷上昇，超過總財富的30%，而50%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在過去50年里沒有實質性增長，政府沒有合理的二次分配調節制度或改革，造成美國的極化現象不斷加重。

美國國內的極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財力再像過去一樣爲全球經濟秩序付出，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不斷“退群”，但大家也不要簡單地把美

國“退群”理解爲美國在主動讓出世界領導地位，這是錯誤的。

美國的“退群”只是美國以退爲進的戰略調整，目標是爲了美國更好地保持世界第一，美國只是從策略上不再想爲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費服務，以後要想獲得美國的服務，各國需要付費。誰不想付費，就要完全按照美國的規則來。美國其實是通過“退群”的方法，用自己的標準在重新構建新世界體系。我們千萬不要誤判爲這是美國的



衰退，千萬不要誤以爲中國冒頭的時候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樑，現在還遠遠沒到那個時候。中國需要關鍵技術的突破 致力於推進全球創新體系

雖然全球化目前遇到較大的阻力，有回潮之勢，但我們還是要積極地維護和推進一個開放、共融的全球創新體系。

國際上，中國要積極參與WTO改革，因爲美國不干，WTO就持續不下去，中國應該主動幫助重新建立新的規則。如果美國人關注補貼問題、發展中國家待遇問題、國有企業問題，這些問題中國應該都可以談。發展中國家待遇問題，其實對中國已經不再是必不可少，也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受益，更多只是名聲問題，爲什麼不可以談？

同時，在國內我們要切實減少政府干預。除了少數技術路線比

較成熟的產業，比如芯片，應該由政府一定的資金進入和相關扶持之外，其他的一定要交給市場。市場才是創新主體。因爲誰也不知道創新從哪裏來，沒人能在幾十年前知道華爲的今天。20多年前，當互聯網興起時，誰能預測馬雲、馬化騰的成功？這些都是從市場中自己長出來的。

最後，我們要與美國保持經貿領域的深度融合，完全脫鉤是不可能的。現在有一種論調，認爲中國應該趁機放棄和美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跟美國說因爲疫情，中國已經無法執行協定。我覺得這種人不是瘋子就是傻子。美國要中國買他們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美國還想跟中國在一起，這是一個跟美國深度融合的絕佳機會，而且我們也需要能源、大豆和飛機。

但是我們可以跟美國談，可能因爲疫情，按照原計劃在兩年內完成有難度，能不能延長爲三到四年完成。前一段劉鶴副總理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通了電話，兩個人放出來的信號都說談得非常好，說明雙方依然還保有默契。

我的建議是，我們不僅要履行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而且要積極開展第二輪貿易談判。

因爲美方透露出來的談判議題就是美國要在WTO里進行的，剛好是中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機會。

我們總說美國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我們也要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如果美國願意先跟中國談，談了之後拿着談判結果到WTO做模板，照着修改，那不就代表我們參與了國際規則的制定嗎？

最後再強調一下：中國和美國作爲大國，都要致力於形成一個既有競爭，同時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關係，最大程度地避免滑向熱戰。

伯恩斯擔任駐華大使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積極信號

Original BJ 王明遠 卓成門六號院

伯恩斯屬於美國高官或學者中，對華最積極友好的一類，即使中美交惡後，也沒有對中國落井下石，仍扮演調停者、對話者的角色。拜登經過反復權衡把他提名爲新任駐華大使，無疑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積極信號。

1.今天美國總統拜登提名前副國務卿、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爲新任駐華大使人選，懸空已久的駐華大使任命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2.這里首先要說一下，爲什麼美國駐華大使空缺了長達十個多月的時間。很多人都揣測是因爲中美關係變差，美國故意不派新大使，這個揣測實質是不成立的。美國駐外大使分爲兩類，一類是職業外交官(career diplomat—CD)，一類是政治任命型的(political appointee—PA)，前一類不受總統更換的影響，而後一類在新的總統就職之後就要辭職，然後，新當選總統重新委派一個大使。

美國12任駐華大使中，有7位是政治任命型的，最近的一位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在來華之前擔任愛荷華州長，當然也屬於政治任命型大使，他於2020年10月辭職回國，美國媒體普遍推測他辭職回來是想幫特朗普的競選拉票。本屆政府的駐華大使僅剩下3個月的任期，特朗普不可能再任命一位新的駐華大使，所以就由美國駐華使團副團長 Robert W. Forden(職業外交官)代理大使，直到新當選的總統派出新的大使。

拜登上任後，有103個國家大使需要重新任命(言外之意特朗普曾經任命了103位大使)，至今只完成駐墨西哥大使的任命，剩下的102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大使職位也都是懸空已久。最近拜登提名了34個國家的新大使，需要等待參議院的表決，但是至今仍有67個國家，連大使的提名人選都沒有。

所以，美國駐華大使的職位空懸這麼久，雖然看似不正常，但是又是美國權力交接的一個正常產物。其實，1981年卡特、里根交接之際，也曾經有駐華大使空缺席間長達8個多月的記錄，直到當年9月底才派出新大使。

3.那麼新任駐華大使人選伯恩斯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筆者結合與拜登同一天提名的駐日本大使，以及前不久提名的駐印度、德國、西班牙等關鍵國家大使人選，進行比較分析。

首先，伯恩斯是個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官。他於1980年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高級研究院，衆所周知這個研究院是世界最頂級的，是美國外交官的搖籃。畢業後，伯恩斯就擔任職業外交官，先是負責蘇聯東歐事務，

1997年後擔任駐希臘和北約大使，2005年又擔任副國務卿。

2008年從副國務卿位子上卸任的伯恩斯，受聘爲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同時還擔任多家著名國際關係智庫的董事或執行官，成爲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政治專家之一。所以，伯恩斯是個很有經驗和理論素養的職業外交官。

而拜登同時任命的駐日本大使 Rahm Emanuel 之前曾經擔任芝加哥市長，駐印度大使 Eric Michael Garcetti 曾經擔任洛杉磯市長，他們都沒有任何外交經驗。可見，拜登選擇伯恩斯這樣的老牌外交官擔任駐華大使，是對華關係的重視，是希望找一個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人，來處理中美關係中的各種複雜問題。

伯恩斯還在拜登競選總統期間擔任其外交政策顧問，他與拜登算是老相識。這也顯示拜登希望物色一個可以直接向其彙報、溝通，又非常信任的人選，這樣可以更有效處理中美關係中的事務。伯恩斯可謂拜登在外交上不可多得的人才，經過種種考量，把他委派到北京，顯示拜登對處理中美關係的極大重視與謹慎。伯恩斯是1995年芮效儉(Stapleton Joy)卸任以來職業外交官色彩最濃的駐華大使，也是曾經在國務院任職級別最高的駐華大使。



2019年的伯恩斯與拜登

4.其次，伯恩斯是個與中國打交道很久，並且對中國一直很友好的一個外交官。就目前可以查閱的美國國務院網絡檔案來看，早在1997年4月錢其琛訪問美國時，當時擔任助理國務卿的伯恩斯，就參與了錢其琛跟奧爾布萊特的會談。這次會談是中美關係好轉的一個重要步驟，奠定了當年秋天江澤民主席訪美的基礎。

2005年後，伯恩斯擔任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排名第二)，有更多的機會涉足對華關

係。他於2006年與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篪一起主持了第三次中美戰略對話，這年10月1日，他又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出席國慶招待會，2008年，他還出席駐美大使館的新館開幕典禮。

伯恩斯在副國務卿的任期內多次發表對華友善觀點，他反對遏制中國的主張，認爲應該以對話的方式與中國建立起一種建設性的關係。他還贊成讓中國承擔部分全球事務的領導權，主張讓中國加入“世界董事會”，“作爲由美國、日本等世界富有責任的國家組成的董事會的一員”。他2006年說這句話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完全崛起，中國人自己都還很少考慮這方面的事情，而伯恩斯能做出這樣的表態是很難能可貴的。

2008年，伯恩斯辭去副國務卿職務後，與中國建立起諸多更緊密的聯繫。他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貝爾弗科學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執行董事，多次爲在肯尼迪學院進修的中國高級官員授課。他還曾經主持著名外交智庫阿彭斯研究所(Aspen Institute)與中央黨校的對話。

伯恩斯還擔任美國諮詢公司科恩集團(Cohen Group)的首席高級顧問，科恩集團是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創辦的諮詢公司，中國是其最重要國外市場，在北京和天津設有辦事處。該集團稱，自從2008年起，幫助中國企業累計完成800億跨國並購。科恩集團還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美中關係委員會等高端對話的積極參與者，是美國最積極致力於中美友好的機構之一。

雖然，這期間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美國對華敵對聲音甚囂塵上。伯恩斯一直毫不掩飾反對將中國稱爲敵人的做法，2016年5月他在威爾遜國際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發表演講說：“我們很多人由於聚焦在競爭上以及雙邊關係中的軍事部分而犯的錯誤，就是把中國看作敵人，或是對抗者，或是要加以遏制的國家。我國的一些政治保守派就是這樣看待中國的，這將是個嚴重的錯誤”。他將中美關係定義爲“共生關係”，“不僅是在經濟上，在外交和政治上也是如此”。

5.以2018年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爲標誌，中美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伯恩斯是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最堅定反對者之一。去年，伯恩斯組織庫阿彭斯研究所的學者們編著了《權力的鬥爭：21世紀的美中關係》(The Struggle for Power: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伯恩斯與時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進行對話

一書，並爲此書撰寫了前言，系統闡述了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加上此前他在杜克大學、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專題演講，可以比較完整地呈現他對華思想的基本脈絡。

第一，美國未來的挑戰主要有三個方面：如何遏制俄羅斯機會主義領導人弗拉基米爾·普京對其他國家獨立的攻擊；如何平息中東的暴力，尤其是如何應對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也門四個失敗國家；如何平衡既是朋友又是威脅的中美關係。可以看出來，相較於俄羅斯和中東伊斯蘭勢力，他對中國的措辭最溫和，仍舊強調中國是朋友，有緩和與合作一面。

第二，未來半個世紀中美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不應該視中國爲敵人，中國是合作夥伴，也是戰略競爭對手。

第三，美國應該自信地處理對華關係，既不應該低估中國的優勢，也不應該高估中國的威脅，美國決策層應該認識到自己在制度、軍事、科技等方面的長遠優勢，減少對中國的無端恐懼。

第四，美國應該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合作，遏制中國在南海的擴張，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應該通過解決中美經濟間的傾銷、補貼、知識產權等問題，保護美國公司的利益，促使中國接受國際貿易規則，但是中美經濟不能脫鉤。

第五，儘量增加與中國的合作面，在氣候、反恐、抗擊疫情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應該積極學習奧巴馬時代的美中兩國領導人友好協商的模式。

總體來看，伯恩斯屬於美國高官或學者中，對華最積極友好的一類，即使中美交惡後，也沒有對中國落井下石，仍扮演調停者、對話者的角色。拜登經過反復權衡把他提名爲新任駐華大使，無疑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積極信號。反映了拜登政府對於中美關係，仍有試圖管控、處理危機，不希望全面走向對抗、甚至破裂的一面。但是，中美競爭又是複雜而不可預測的，未來到底怎麼樣，還需拭目以待。